

公开课思维限制了教师的写作想象力

□池沙洲

每个人在义务教育阶段都学过写作,因此,教师往往容易给人一种“很会写文章”的印象。

但实际上,报刊和自媒体上那些逻辑性、思想性、学术性等画出完美的六边形,并具有超强传播性和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文章,出自中小学教师之手的并不多见。

而据一些教育专家之见,当今一线教师的专写作普遍风格干瘪、内容贫乏,同质化倾向严重。

当然,教师最容易找的理由是:忙。但是在眼下这个高度内卷化的社会,除了退休或赋闲在家的人,要找一个“不忙”的职业真的太难。与其他行业相比,教师也不是特别有资格说忙。

那么,问题到底出在哪里?

最近,我听了两节小学语文校内公开课(研讨课),隐隐感觉到,一部分教师写作能力的贫弱,也许就跟这种教研方式有一定关系。或是盛行公开课的地区或学校,教师的写作水平提升的障碍越大。

整个教研活动准备认真而充分,设置了上课、说课、评课和写课指导等全流程环节,还安排了两位教师充当“课堂观察员”,对每节课师生问答的次数、覆盖率和有效性等数据进行统计,巨细靡遗。

参加者均为教龄5年内的教师,通过抽签,临时选取课题和班级。这使得两个团队上课的条件非常公平,情境也非常真实。

无论是上课的两位教师,还是负责评课环节的教师,都表现出相当的自信和娴熟。然而,到了新增设的“写课指导”环节,大家基本上就处于无欲、无感、无语的状态。

也就是说,教师们普遍没有写作的意愿,也不知道怎么写和写什么,他们情愿多上几节课,也不愿意多写一篇文章。这种情况应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。

首先,教师们不了解教育专业写作的一些基本常识。

屈指一算,新课程改革到今天整整20年。我本以为,其中的大多数基本理念早已深入人心。叶澜教授的名言“一个教师写一辈子教案不一定能成为名师,写三年教学反思则可能成为名师”,应该把教师的耳朵都磨出了茧子。

然而,我与这些从师范学院毕业不久、新上岗的教师交流了一下,发现他们竟然不知道“反思”“预设”“生成”等概念。这让我深感震惊。

在场的教师只知道有“教学案例”和“学科论文”的说法,却不知有“教学反思”这种重要的教育专业写作体裁,难道真的是被叶澜教授说中了?

“三年”比“一辈子”更快捷,但“成为名师”也许并非大多数教师成长的目的,他们一般会在“关键时刻”憋出一两篇貌似论文的东西,就直奔评职称等功利性目标而去。

其次,教研活动以公开课为核心,但公开课缺乏问题意识。

一堂课,绝不可能没有一点问题。当天的课堂中,自然也有大大小小的问题。

比如,教师简单地否决了班级中唯一一个男生提出的异议。

这个男生坐下后,心情落寞,无心上课。“课堂观察员”忙于统计各种数据,却忽略了那个男生的情绪表现。

试想,假如一个成年人不被周围的人认同,孤立无援,是何心情?何况一个10岁的、世界观还没有成熟起来的孩子。

如果教师在提问环节中,稍加一些安抚或者鼓励的话语,情况应该会好很多。

教师们所讨论的是一些细枝末节:知识点多放一些还是少放一些,某个知识点放在前面还是放在后面,等等。

一节课中除了传授的知识精确性需要保证,更重要的是,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兴趣激发、思路演绎、价值观建立等。尤其在小学阶段,重视这些非智

力因素的培养,将会深刻影响到学生的日后——自主学习习惯和优良学习品格的养成。

再者,教研活动中的所思所言所为,紧紧依附于若干权威性意见。

很多教师不论是写文章还是发言,总喜欢戴一顶“高帽子”:现在是《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(2022年版)》,过去是部编版教材或“双减”政策,要不就是某位领导或名师在近期某次会议上的讲话,再不行就祭出历史上某位大教育家的语录……

反正,不抬出一个权威就不知道该怎么开场,教师们似乎没想过:权威本身是从哪里来的?其实,权威无非是从解决现实问题中总结经验,被众人认同而已,没有那么神圣。

假如新课标或新教材是颠扑不破、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,那为什么还要做周期性的修订呢?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,斗胆修改这金科玉律呢?

道理其实很简单:任何权威性文本都必须符合时代的需要,根据实际工作的情况变化而不断更新。

这些问题不考虑清楚,教师们只能唯唯听命,做起事情来自缚手脚,不敢越雷池一步。

如果说,缺乏问题意识是基础病,那么,盲从权威就是并发症。

最后,点赞式的同伴评价,削弱了教科研的意义。

由于本次活动范围仅限于校内新教师(仅外请一位教研员作专家总结),教师们上台发言的时候,不用作自我介绍,甚至不必自报姓名,因为她们之间都非常熟悉。

这种平时低头不见抬头见的关系,使得教师们为了顾及同事面子,评课阶段的溢美之词再多也不嫌多。

“良言一句三冬暖,恶语伤人六月寒”诚然不错,但教师们谨依古训,在应该提出宝贵意见的时候点到为止。

我理解,这是人之常情,但我又想起还有一句古训“良药苦口利于病,忠言逆耳利于行”。它告诉大家:有人认真而正式地向你指出问题,是你在成长道路上最好的礼物。

如果说,有了基础病和并发症,那么,“你好我好大家好”式的评课风气就是安慰剂。

公开课的标准就是“完美”,就是为了拿到高分,夺得较靠前的名次。

那么,如果在课堂上遇到预设和生成的冲突,遇到学生回答卡壳等“意外”怎么办?

在公开课上处理真实的问题?谁会这么傻,除非你是高手。

因为,情急之下,问题可能无法解决,余波还会蔓延扩散,直到一发不可收拾,那就彻底歇菜。

赛课可不是教师个人的事情,它肩负的有时是整个教研组,甚至是一个学校的嘱托。

为了让评委不扣分,理性的做法是尽量淡化甚至潜藏危机:有事不接茬、王顾左右而言他,或者选择跳过,直接进入下个环节。而下个环节必须更精彩,精彩到光芒足以掩盖上一个环节的缺憾,足以震撼所有评委,让他们瞬间无法思考,忘记前面不良的小印象。

可这样做,只是掩耳盗铃、一叶障目而已,对学生无益,对写作无益,对教师的自身成长更无益。

这样的公开课就是麻醉剂。偶尔抿一小口无妨,倘若长期猛灌,以为可以续命,损害的将是教研的良性发展,也会限制教师的写作想象力,使他们写不出像样的、有质量的文章。

寻找家校教育责任与分工的边界

——学生不会整体认读音节,谁之过?(续)

烟雨夜雨

教师首先要摆正心态,尊重差异。学生不会就个别辅导,如果还是不会,课间可以安排“小老师”教读,让学生互相学习,共同进步。

教师要求家长在家教读也行,但指责家长大可不必,跟家长沟通言语要得当。家长有条件定然会关心孩子的学习,完成任务;但有些家长没有时间,也没有能力辅导孩子。

人难免有情绪。教师有情绪的时候,容易冲动犯错,一定要缓缓。

杨铁金

这件事所折射的不仅仅有教学方法问题,还有家校之间的教育责任与分工问题。

教师肩负着为党育人、为国育才的责任;同时,应该做好服务学生和家的工作。

教育的属性决定着教师工作的价值。从党管教育的立场看,从行业归类看,教育属于服务性行业,因此,教育工作要做到让党放心,让人民满意。

学校、课堂就是教师应该坚守的阵地,教育教学工作是教师的本分,不应有任何的推诿。

教师工作也应该得到政府部门与家长、社会的理解。尤其是家长,培养孩子自律自觉的学习习惯,远远胜过他律、外力的督促作用。

观 见

我是80后,从小学到大学,我只问过父亲一个字,也没听说其他同学让家长教的。而现在我当了父亲,孩子做作业时却常常来问我。

这是作业出了问题,还是教师出了问题?教师不是万能的,家长也不是万能的。

虽然学校教育需要家庭教育的配合,这是当下的共识,但是,当教师的应该爱岗敬业,传道解惑,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,对学生因材施教,而不是责怪家长不教。

倪华东

这一事件折射的是担当精神的缺失,教育者面对后进生时,缺乏包容与担当。特别是面对刚上学的学生,对其在学习中的问题,没有给予足够的包容和等待。

或许在之前,教师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,但这不应是罚站、拍视频的理由。

若真的是学生接受能力差,罚站也没有用;但若是学生不认真,小施惩戒则可,最多与学生家长私下交流,发大群的目的何在?

“家长是怎么辅导的?”这一问把教学的责任推到家长身上。

教育局更不应以教师不在编作为解释的理由。既然站上讲台,就应以“教育者”的身份要求自己,行为失当和是否在编无关。

该区域从上到下缺乏“勇于认错、勇于担责”的精神,当地教育局在对所辖教师群体的引领、规范、监督上存在着很大的失责。

徐如松

学生不会整体认读音节,第一责任肯定在教师。

课堂教学中,要让每个学生都不掉队确实有些困难,教师得从个性差异出发,想办法给学生“开小灶”,或组织学生开“帮帮团”,还可以联系家长介入“助教”。

总之,教师要掌握学情,让每个学生得到不同程度的发展,而不应该怪罪于家长,更不应该感情用事。

龙泉许东宝

不要有事就把责任推给聘用教师,也不能用有色眼镜看待聘用教师。

我的小学就是聘用教师教的,是聘用教师造就了我,我现在都感恩他们。

或许,他们没有高学历,没有一张张的证,但聘用教师非常用心地在工作,他们中的很多人业绩比公办教师都要好。

学生学不会,教师应该找自身原因,抽空给学生补补,不能指望家长。遇到好说话的家长,或许没什么事;如果遇上“刺头”家长,你怎么收场?

拼音是基础,但对于很多上了年纪的家长来说,也是难点。教师让家长在家指导,可能有助于全班学生共同提高,但如果家长不会教,也是人之常情。

教师要摆正位置,调整好心态,沉入到教室里,走进学生心里——好好教书,好好育人就是。

举字牌游戏

□宁波市镇海区贵驷小学 胡晓玲

二年级开始说话后,学生“的、地、得”使用错误频出。根据我以往的教学经验,很多学生一直到高年级都不能正确使用这三个字。

受到拍卖时举牌报价的启发,我在班级开展了有趣的举字牌游戏。

我让每个学生用雪糕棒、硬纸板做好三个字牌,为醒目起见,硬纸板的大小为A4纸的四分之一,并用水彩笔或马克笔分别在字牌上写“的、地、得”三个字。

上课时,我细细地讲解这三个字的用法,等学生熟记后,游戏就开始了。

我在课件上出示:“我们()家。”

学生们赶紧唰唰地举起字牌,哪些学生正确,哪些学生错误,一目了然。

接着,我也举起正确的字牌,公布答案。同时,还会请答对的学生来解释,让弄错的学生得到同伴的指点。

然后,我出示另一道题……

玩过一轮后,我请学生上台来出题,可以直接口述,也可以事先在PPT上写好。

我请经常弄错的学生出题,让他们直面自己的困惑。

课堂中通常可见的“一问一答”,往往只局限在几个学生身上,大部分学生缺乏参与感,因而不会认真地对待。

而举字牌游戏实现“一对全班”,使师生互动真正有效。学生在游戏中勤于动脑,在学中玩,在玩中学,比教师不厌其烦地讲解更受学生欢迎,也更容易巩固所学知识。

举字牌游戏不仅可以在课上玩,也可以在课后继续玩;可以和同桌玩、和好朋友玩、四人小组玩,也可以回家和家人一起玩。

小小的举字牌游戏,带来了良好的教学效果。现在,班里绝大部分学生都能正确使用“的、地、得”。为进一步巩固成果,每过几个星期,我们就开展一次举字牌游戏,学生的兴趣始终高涨。



拍案惊奇

对自己的名字负责

□嵊州市城北小学 尹蔡英

教室里很多学生的作文写得不错。我想到一个主意,让学生互相分享自己的作文,并评价同学的作文,末了,在作文上签自己的名字。

“我要对签名的个数进行登记。”我加了一句。

做操回来,我看到学生们热火朝天地忙开了,原先不愿意让别人看自己作文的学生,一改往日的矜持。我满意地离开了教室。

回到办公室,我略显得意地对班主任孙老师说:“我这一小招,效果不错呢。”

“别高兴得太早了,”孙老师笑道,“说不定他们只是签了个名而已。”

我心里一惊。上课铃响了,我走进教室,看到学生们脸上带着笑。

我随手拿过一个学生的作文本,看到作文下方签着好几个学生的名字。我叫出其中一个名字,让这个学生说说这篇作文的内容。

被点名的学生站起来,说不出话,不知所措。

“所以,你没读过这篇作文,就签了名?”

这个学生点点头。

我又换了另一本作文本,叫起了另一个学生,他同样也答不上来。

我沉着脸,看着全班学生,教室里的空气都凝固了。

“没读过作文就直接签名的,请自觉站起来。”

一个、两个、三个……留在座位上的只有个位数,这些学生坐得格外直挺,眼睛亮闪闪地看着我。

站起来的占绝大多数,都低着头。

我缓缓地说:“我以为,你们为自己的优秀而自豪;我以为,你们愿意与同学分享成果;我以为,你们喜欢向优秀的同学学习;我以为,你们会真诚地夸赞同学,并向同学提出建议;我以为,你们签下自己名字的时候,是诚实的……原来,是我想错了。还是你们的班主任最了解你们啊。我这样信任你们,是我太幼稚了,还是你们太高明了?”

学生的表情有自责,有后悔,有震惊,坐着的那几个学生则是庆幸。

“你的名字,是你的形象,是你的品质。你们长大以后,会在很多场合签下你们尊贵的大名,那是你许下的一份承诺,很多时候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”我继续说。

“我相信,你们中有很多人一开始并不想追求签名的个数,那么,后来心情是怎么变化的?从这件事中,你有哪些反思?下课后,凡是有你签名的作文,请重新阅读,并在自己的名字边上打个钩,以弥补你的

错误。让你自己的名字,能够堂堂正正地出现。”同时,我布置了一个作业,让学生把今天的事写在日记本上。

在日记中,学生描写心理活动真切细致,有的对错误有比较充分的认识,也有的为自己的正确坚持而自豪。

“开始是真心诚意要学习同学作文的优点的,但在作文文本的主人‘快点快点’的催促下,乱了阵脚。”

“很快就自我安慰:我先为同学们签名再说,有空再读作文好了。”

“到后来,只要有本子递过来,只管签名,都不知道是谁的作文本,也不知道自己到底签了几个名字,想不到平时安静的自己,竟这么受同学欢迎,简直成了大明星。”

……

这堂语文课学的虽然不是书本上的知识,可学生受到的教育并不少。

其实,此前在课堂上,学生之间经常互相批改评阅;但没想到,课外缺乏监督,就出现了问题。

学生出现问题的时候,正是教育的契机,也是写作练习的时机。利用学生不经意间暴露的问题,经过“还是你们太高明了?”的心灵扣问,学生内心触动很大,习作有感而发,一气呵成。

在真实情境中开展带有学科特质的教育,左手教书,右手育人。

教师话坊

中国教育期刊优秀作品评选金奖栏目

本话题可继续讨论——

